

# 东盟职教研究简报

2023年第1期（总第18期）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制

2023年3月

## 中心动态

我院参加“非洲国家专业标准开发项目—塞拉利昂”启动仪式  
老挝琅南塔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陈富强主任来我校座谈  
交流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召开工作部署推进会

## 东盟资讯

“钻石六边”开拓中柬关系光明未来

澜湄合作造福缅甸人民

中泰合作“中文+职业技能”电子商务系列教材在泰国出版

马来西亚促进与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增进交流互鉴 广西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多点开花”

## 国别研究

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政策与实践类型研究

## 热点分析

大国竞争下，东盟如何坚守平衡外交，走稳崛起之路？

## ◎中心动态

### 我院参加“非洲国家专业标准开发项目—塞拉利昂”启动仪式

2023年3月28日下午，由世界教育组织联合会（ITEA）与塞拉利昂教育部共同主办的“非洲国家专业标准开发项目—塞拉利昂”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我院院长项光亚、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代亚松、教务科科长李东明及各二级教学单位教师代表参加了在线会议。

会议共有11项议程，由黎明职业大学副校长李云龙先生主持。世界教育组织联合会(ITEA)代表、拿督萧进平先生首先做了欢迎致辞，我院院长项光亚同志在启动仪式上发言，他表示铜仁职院一直按照“立足东盟、面向亚洲、放眼世界”的国际化办学思路，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为“一带一路”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我院将继续汇聚优势力量，为中非职教合作作出贡献。

会上，各院校参会代表纷纷发言致辞，介绍各自学校办学情况，并对项目启动仪式表示热烈祝贺。最后，塞拉利昂教育部部长阿尔法·泰詹·武里（Alpha Tejan Wurie）教授做了“塞拉利昂国家职业教育现状及发展”主旨报告。通过此次会议，我院将积极推动非洲国家专业标准开发项目，努力实现与塞拉利昂职业教育的合作共建、共享、共赢。（来源：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新闻网）

### 老挝琅南塔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陈富强主任来我校座谈 交流

三月仲春，草长莺飞。2月26日行政楼三楼会客厅，老挝琅南塔

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主任陈富强来我校访问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代亚松、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邓振华出席座谈会，党政办副主任徐瑶主持会议，学院外事办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座谈会。

邓振华对陈富强主任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学院近年来国际化办学情况。代亚松表示多年以来双方在教育交流合作成果颇丰，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加强交流和沟通。张攀介绍我院老挝留学生优秀校友工作情况。陈富强表示，感谢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一直以来对老挝留学生的关心和照顾，老挝琅南塔省教育厅将继续加强与我院在国际教育、师资培训、访学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双方就国际学生招生和国际学生教育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来源：铜仁职院国际教育学院）**

###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召开工作部署推进会**

3月1日，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在C4-4教室召开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工作部署推进会。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邓振华、副院长征玉韦及中心小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赵岩主持。

会上，赵岩老师对中心2022年的工作做总结并对中心本学期工作做计划安排。首先从四个方面对中心工作做总结：一是中心常规工作，分别是召开6次工作推进会、举办3期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沙龙、定期推送8期《东盟职教研究简报》、开展学术指导交流会议1次、参加暑假外语非通用语教师研修班9人次等；二是中心招标课题立项9项课

题，其中一项课题为首次向国外院校老挝国立大学委托课题，首次邀请1名国际知名职教专家参与中心研究项目，最后督促中心成员积极完成课题结题工作；三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双高任务，完成“技能贵州”国际交流合作示范校并获批，配合完成典型案例1个，主持完成《中国文化体验》标准输出项目等；四是中心存在的问题，成果产出不足，专职研究人员不足，无办公场所等。其次从四个方面对中心本学期工作做计划安排：一是按时完成中心常规工作并做好记录；二是完成学校重点工作任务，“双高计划”建设任务和国际交流合作示范校工作任务；三是加强学习、调研，积极参加学术论坛，在政策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赴国外开展学习交流和田野调查。四是重点推进中心科研成果产出，积极组织申报省市厅课题，撰写论文和咨政报告等。

随后，邓院长总结发言，从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的获批和成立，我们肩上是有责任和任务，中心工作要扎实稳打的推进，高质量完成，各国别研究室小组长每月按时收集和关注最新东盟教育资讯，为撰写咨政报告做准备，时刻关注东盟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担负责任，不负使命，为东盟职业教育研究做出贡献。（来源：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 ◎东盟资讯

### “钻石六边”开拓中柬关系光明未来

2月9~11日的三天访华之旅，使柬埔寨首相洪森成为2023年中国农历春节之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洪森此访距李克强总理访柬仅三个月时间，体现出两国领导人的“常来常往”。习近平主席会见洪森时，提出着力打造包括政治、产能、农业、能源、安全、人文六大领域的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为两国未来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 一、洪森来华赶赴“三年之约”

洪森在访华前曾表示，本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纪念自己“逆行访华”三周年。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在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柬埔寨政府首先向世界宣布采取“不撤侨、不停航、不歧视中国人”的“三不”举措，随后在西方国家的一片反对和质疑声中，洪森成功访华，给中国抗疫以“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三年后，洪森的再度访华又一次反击了西方舆论对中国抗疫政策调整的抹黑。洪森的两次来访体现出柬埔寨对中国抗疫政策有始有终的支持。

习主席在会见洪森时表示：“我很高兴同你实现‘三年之约’，在新春之际共同开启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新时代。”三年里，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向柬埔寨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抗疫支持。中国向柬埔寨提供的疫苗超过4200万剂，保障了柬埔寨政府在全国施行“花开”接种计划。如今，每一位柬埔寨民众都有机会接种第三剂加强针。中国向柬埔寨派遣多支抗疫医疗队，帮助柬埔寨开展防疫工作。2022

年3月，中国向柬埔寨派遣的首支中医抗疫医疗队实现了中医在柬埔寨驻点问诊，将中医“留”在了柬埔寨。同时，中柬合作建设的疫苗灌装厂也将在柬埔寨动工。习主席与洪森的“三年之约”体现出中柬两国在防疫抗疫上的鼎力相助是始终如一的。

## 二、中柬关系持续高位运行

目前，中柬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边合作未因疫情全球暴发而受到严重影响，反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和累累的硕果。

第一，两国政治互信增强。一是中柬高层保持战略沟通。通过领导人互访、通电话、召开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会议等形式，中柬双方在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防范“颜色革命”、打击网络犯罪、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达成深刻共识。中柬两军还将于今年3月恢复因疫情暂停的“金龙”联合训练。二是两国政府和人民赓续传统友好。习近平主席向莫尼列太后颁授“友谊勋章”，表达了中柬一道传承和发扬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结的中柬友谊的决心。2022年正值西哈努克太皇诞辰100周年，中柬两国政府、民间机构以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和招待会等形式，追忆太皇与中国的不解情缘。三是柬埔寨坚定支持中国南海立场。在柬埔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洪森曾表示，柬埔寨将努力促成“南海行为准则”签署。中柬还通过联合声明，发出持续深化双边海上合作的信号。两国海上合作既定位于共同推动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实质、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也聚焦于共同反对任何利用南海问题破坏地区和平与互信的图谋。

第二，两国经贸合作高涨。在全球经济因疫情影响而持续衰退的背景下，中柬贸易逆势上扬。两国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95.6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160.2亿美元，涨幅高达67.6%。而且2021年中柬贸易额即超过100亿美元，提前实现两国领导人制定的2023年达到这一数额的目标。2020年10月中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最不发达国家商签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也是柬埔寨的首个双边自贸协定。两国相互给予对方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税目比例达97.5%和90%，是双方迄今所有自贸协定谈判中的最高水平，为柬埔寨与他国商签自贸协定提供了样板。协定的签署和生效刺激了中柬农业合作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市场。此外，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援助等方式，中国农业技术正在帮助柬埔寨农产品提高质量、产量和附加值，为柬埔寨解决农产品种植加工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三，援建项目亮点频现。2021年12月，中国援建的柬埔寨德佐国家体育场交付使用。这座体育场不仅在全球知名体育网站Stadiumb2021年度最佳体育场评选中排名第六，更将成为柬埔寨主办第32届东南亚运动会的主会场。2022年是中国在柬援建项目成果集中呈现的一年。一是中国援建的考斯玛中柬友谊医院、特本克蒙省医院先后投入使用，缓解了柬埔寨民众“看病难”的问题。二是“金港高速”开启柬埔寨高速公路时代。“金港高速”是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大大减少了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的通勤时间，提升了通勤安全性。更重要的是，这条高速公路为沿线的干丹、磅士卑和国公三省带

去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除此之外，中国援建的道路、桥梁打通了柬埔寨国内物流血脉。桑河二级水电站等中国在柬电力项目有效缓解了柬埔寨“用电难”的问题。

第四，两国人文交流频仍。中柬务实合作推动中文成为柬埔寨青年就业的“敲门砖”，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在柬埔寨掀起，中文教育也随之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约25%的柬埔寨高校开设了面向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等不同层次人才的中文课程。基于柬埔寨学习中文的社会需求，2022年11月，双方教育部门签署了中柬“关于合作开展柬埔寨中学中文教育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将中文教育正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同时，中国援柬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也长期扎根吴哥古迹的保护与修复工作。继成功完成周萨神庙、茶胶寺修复任务后，柬埔寨政府又将位于吴哥古迹核心区域的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交付中国团队，体现出柬埔寨政府对中国团队既往工作成绩的肯定与信任。

### 三、“钻石六边”打造发展未来

洪森此访的主要目的是具体落实和商讨拓展中柬业已达成的合作意向。洪森在出访前曾表示，自己访华的具体目标是要在基建、农业和旅游领域争取中国更多支持。结果表明，洪森此访的收获超出预期。习主席提出的“钻石六边”合作架构既回应了柬埔寨的发展诉求，更彰显了中柬关系的全方位，具有国际示范性。

第一，“钻石六边”合作架构是中国对柬埔寨发展诉求的回应。柬埔寨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物流体系有待完善，整体社会治理



能力有待提升。然而，在人民党政府领导下，柬埔寨始终保有旺盛的发展愿望。2004年以来，柬埔寨政府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人才资源几方面的“四角战略”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柬埔寨主动将“四角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目的就是吸引更多投资，改善国家基建，提升技术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从“钻石六边”合作架构的具体内容看，建设“工业发展走廊”“鱼米走廊”，助力西哈努克省多功能经济示范区建设，支持柬方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加大对柬水电、光伏发电项目投入，共同打造文化和旅游产品等设计，都是为中柬合作“量身定制”的内容，完全契合双方利益和柬埔寨发展的现实所需。

第二，“钻石六边”合作架构彰显了中柬关系的全方位发展。有舆论一度曾以“经济—安全二元格局”解释东南亚国家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权衡考量，认为冷战后东南亚形成了“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秩序格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步入第十个年头，世界上认同和支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观和全球安全观的国家越来越多，“经济—安全二元格局”已经不足以解释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态势。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不仅涵盖了产能、农业、能源等经济领域，更将政治、安全和人文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体现出了中柬关系的全方位发展。并且，“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不是无根之水，而是建立在中柬“铁杆友谊”和既有合作基础上的水到渠成，更为下一步建设中柬命运共同体擘画了蓝图。

第三，“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为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树立了典范。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将中国周边地区视为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沿阵地，通过鼓吹和实施“印太战略”，试图运用拉拢、制裁、“长臂管辖”等手段迫使东南亚国家选择美国一边站，加入遏华阵营。相较而言，中国构建的新型周边关系建立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之上，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其根本目标是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就是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集中体现，不仅充实了新时代国际关系内涵，更为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外交往赋予了更多选择，提供了更广泛借鉴。

2023年是中柬关系发展的重要一年。一方面，两国将共同庆祝建交65周年，举办“中柬友好年”系列活动。另一方面，中柬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带来的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中柬经贸合作正迎来新的机遇。此时提出“钻石六边”合作架构可谓既应时，又应势，将为中柬关系向前、向好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更将开拓中柬关系发展的光明未来。（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

### **澜湄合作造福缅甸人民**

在第六个“澜湄周”之际，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于3月20日在缅甸官媒《镜报》发表题为《澜湄合作造福缅甸人民》的署名文章，通过数据和实例展现中缅澜湄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澜湄合作的光明未来。全文如下：

今年是澜湄合作启动七周年，3月20日我们迎来第六个“澜湄

周”。在中缅等流域六国共同努力下，澜湄合作在短短七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合作“金色样板”，为地区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

缅甸是澜湄合作首倡地，也是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方。中缅两国是邻居和伙伴，正在共建命运共同体。两年来双方担任澜湄合作共同主席国，在澜湄框架下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上个月，我和湄公河国家驻缅使节共同参加了缅方组织的澜湄合作项目参访活动，感受了澜湄合作给缅甸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好处。中方设立的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缅方开展了 92 个项目，数量和资金量均居湄公河国家前列，进展和成果也十分喜人。缅方在活动上表示，“澜湄合作是湄公河流域最成功的合作机制，比其他湄公河合作机制都更注重实效。”这句话引发在场人士共鸣，湄公河国家使节也都肯定澜湄合作推动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的积极作用。澜湄合作启动以来，始终追求务实高效，不做高大上的“清谈馆”，而是做接地气的“推土机”，扎扎实实地推进合作进程，让澜湄合作每天都有新进展，每月都有新成果，每年都迈上新台阶，让澜湄六国民众都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澜湄合作的成果。

缅甸是农业国家，农业也是中缅澜湄合作项目最集中、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农业项目占中缅澜湄合作项目的一半。就拿缅甸朋友最熟悉的鱼汤米线来举例。米线由大米磨制而成，缅甸自然禀赋优越，出产优质稻米远销国外，其中波山米更曾被誉为“世界最好大米”。缅甸大米质量虽好，单位产量却有待提高。为了帮助缅农民提高水稻亩

产量，2018年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缅方开展了“水稻良种培育以及优化种植项目”。毛淡棉大学副校长、植物学博士珊珊埃女士和福建农林大学专家共同培育优良稻种，加强水稻耐涝性，将产量提高了3%-10%。珊珊埃博士说，“我们的新种子，父亲来自中国，母亲来自缅甸，他们将会是最优秀的孩子”。澜湄基金还支持在仰光、伊洛瓦底、德林达依省、若开邦等9个省邦开展“中小渔产品加工设施质量保证体系改造项目”，规范产品技术标准，改进加工过程，开展了近百次工人技能培训、三百余次产品和水质检测，有效提升了缅甸渔产品加工水平，让更安全优质的渔产品成为鱼汤米线的汤底，并进入国际市场，跃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中缅澜湄合作重视增加缅甸老百姓民生福祉，坚持在缅甸开展可持续、惠民生、高质量、“小而美”的项目。缅甸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七成左右。“改善橡胶种植生产项目”为缅甸农民提供了5万株橡胶树苗，分发近3万份技术手册；“农村发展和蔬菜栽培技术转移项目”通过示范农场向缅甸农民传授蔬菜栽培技术；“水果深加工”、“食品加工培训中心”等项目帮助提升咖啡、蔬果、澳洲坚果等缅本土农产品附加值；“改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促进澜湄地区新鲜水果贸易项目”畅通缅农产品出口……这些项目令农民的生产资料得到改善，技能得到提升，钱袋子鼓了起来，生活更加有奔头。另外，还建设了“缅甸国家级太阳能光伏应用推广培训中心”、在甘茂吉和耶甘吉两地实施“太阳能微型电网供电及配水工程”，开展“湄公河缅甸万崩港扩建提升可行性研究”等，帮助缅甸解决电力、交通等制约发

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设施问题；发起“澜湄合作国家村级减贫创新模式倡议”、“以交流促澜湄国家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联盟”等，加强脱贫减贫经验交流互鉴。

中缅澜湄合作致力于帮助缅甸提升综合国力，缩小地区国家差距，共创更美好的澜湄家园。通过“缅甸澜湄投资研讨会”、“缅老边境景乐贸易便利化办公室”、“澜湄国家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投资的最佳实践”等项目促进缅甸贸易投资发展；帮助支持缅甸制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路线图，建立缅甸 ICT 发展研究所，开展澜湄大学间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缅甸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缅中柬教师交流计划”及各行业职业培训助力教育事业和人力资源发展。我们还通过“缅甸湄公河流域有毒有机污染物的监测与评估”、“跨境雾霾污染空气质量监测与评价”等项目，形成更紧密的地区环境监控保护网络，共创澜湄美丽家园；通过“澜湄文化交流青年营”、“澜湄雕塑绘画青年营”、“澜湄木偶节”、“澜湄传统舞蹈节”等异彩纷呈的人文交流项目深化澜湄六国相互了解和睦邻友好，共创澜湄人文家园。中缅澜湄合作的成功实践证明，澜湄合作造福六国人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世界并不太平，动荡与变革交织，团结与分裂碰撞，机遇与挑战并存。澜湄六国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正如缅甸谚语所言，“浪虽大舟凌其上，峰再高始于足下”。只要我们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就一定能乘风破浪，绘就区域合作更加辉煌的“金色五年”。今年是中国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中国人民正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将为包括缅甸在内的湄公河国家带来更大发展机遇。我们愿同缅甸各界共同努力，推动中缅关系及澜湄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为缅甸及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相信澜湄合作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

### 中泰合作“中文+职业技能”电子商务系列教材在泰国出版

3月16日从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获悉，日前由该校参与的中泰合作“中文+职业技能”电子商务系列教材，已由泰国教育部所属泰国教育教师福利委员会出版社正式在泰出版。

该套教材内含《电子商务导论与运营基础》《电子商务运营实务》《电商数据化运营》三本教材和配套资源，由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以下简称全国电商行指委)和“一带一路”电商谷产教融合国际合作项目发展理事会组织中泰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已被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认定为推荐课程。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介绍，自2017年起，在全国电商行指委指导下，该校携手北京博导前程股份有限公司，发挥电子商务专业特色优势，面向东盟打造“电商谷”项目，建成“电商谷”清迈中心和南宁分中心，开展标准共建、职业技能培训、创新创业训练营、创新创业比赛等活动，推动泰国100多所职业院校参与中泰合作“中文+职业技能”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已与泰国清迈大学、泰国沙旺丹叮技术学院等建立了5个“中文+电子商务职业技能”校际推

广基地，累计培训10000多人次。泰国“电商谷”清迈中心自2019年运营，累计培训泰北地区中小企业人员超5000人次，为3家商家创造的收入价值超过500万泰铢。学习成果获得中泰两国各合作方的共同认可与认证。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也荣获了首批中泰合作“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示范校。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表示，中泰合作“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电子商务系列教材作为首套1+X证书国际化教材发布，标志着“电商谷”项目进入成熟规模化推广阶段，将更好地服务普及数字技能，提升数字技能人才发展的价值和空间，提高技能国际合作水平。（来源：中新网）

### 马来西亚促进与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TI)部长扎夫鲁尔·阿齐兹(Zafrul Aziz)强调，该国对东盟的承诺在其与其他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中具有战略重要性。

扎夫鲁尔·阿齐兹在3月9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商业领袖峰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国是马来西亚乃至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和中国可以塑造亚洲时代的方向。

扎夫鲁尔·阿齐兹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成为有力支撑因素，因为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增速在RCEP生效第一年的2022年已达到15%的增速水平。

扎夫鲁尔·阿齐兹还指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经历了许多挑战，特别是双边贸易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消极影响，从2019

年的 6415 亿越盾增至 2022 年的 9753 亿美元。2022 年，中国以 125 亿美元的投资总额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国投资商。

为了在后疫情时代促进地区经济复苏背景下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关系，扎夫鲁尔·阿齐兹建议马来西亚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一起考虑与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各国建立多边合作伙伴关系。（来源：越通社）

### 增进交流互鉴 广西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多点开花”

“作为一所以国际化为办学特色的语言类高校，我们积极构建‘小语种’特色发展新格局，已与泰国两所大学共建国际学院，拓展了广西与东盟国家高校之间的深度合作。”广西政协委员、广西外国语学院董事长韦茜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南宁举行，韦茜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介绍，该校与泰国西北大学、泰国梅州大学共建国际学院，促进中泰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步入新台阶。其中，与泰国西北大学合作的硕博项目专业增至 6 个，学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目前，广西外国语学院与泰国、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等国家 70 多所大学签订交流合作协议，招收了 1500 多名国际生，同时派送逾 5000 名中国学生赴合作高校接受学分互认的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日益密切的经贸交流，需要大量既懂语言又具备专业特长的人才。”韦茜称，该校部分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



13个专业增加东盟模块课程学习。该校着力把小语种做成“大事业”，即做大东盟国家语种专业数量、做大东盟国家语种专业教师团队规模和做大东盟国家语种专业学生规模。

广西外国语学院是广西高校深化与东盟教育开放合作的一个缩影。目前，广西与东盟国家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多点开花”。广西民族大学是中国较早开展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的高等院校之一，累计招收培养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近两万人。该校是广西招收东盟国家留学生较多的高校，为东盟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桂林旅游学院正在探索与柬埔寨合作建设柬埔寨旅游学院，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旅游人才培养高地。

广西已成为中国接收东盟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区之一，“留学广西”品牌效应不断扩大。广西高校在东盟国家建立了8所孔子学院，10余所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为驻外中资企业和东盟国家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今年1月初，广西—东盟华教联盟在广西南宁市成立，目前已吸引129所学校和华文教育机构加入。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负责人表示，广西将以建设中国—东盟教育开放合作试验区为契机，打造面向东盟的教育合作高地。（来源：东盟头条）

## ◎ 国别研究

### 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政策与实践类型研究

姚敏

(姚敏, 北京华文学院专修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摘要:**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人移居海外最早的地区, 早期华文教育的发展路径也十分相似。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实践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走向, 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从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政策及其实践路径来看, 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以新加坡为典型的自上而下型, 以马来西亚为典型的自下而上型, 以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和文莱为适度平衡型及以缅甸为典型的夹缝生存型。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不同类型华文教育形成的原因, 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 进而更加科学地、有针对性地提高中外友好交流的成效。

**关键词:** 东南亚; 华文教育; 政策类型; 教育实践

21 世纪以来,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尤其 2020 年起, 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已提升到了更高水平<sup>[1]</sup>。随着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未来东南亚地区将对中国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

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sup>[2]</sup>历史悠久, 各国华文教育独具特色。本文聚焦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政策与各国华文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 探索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特点及规律, 以期对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 一、华文教育政策实践类型分析

语言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语言教育目的而颁布的法令、法规及指导性文件, 决定了该国语言教育的走向。不同国家的华文教育政策对其华文教育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语言政策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至 21 世纪初, 语言政策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的早期语言政策研究, 研究特点是集中关注民族国家, 尤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门颁布的语言政策, 因而更加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路径。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此时语言政策研究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特点表现为关注权利、不平等现象及强迫性语言学习和语言行为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都认定语言政策是造成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利不平等分配的重要机制<sup>[3]</sup>。新的研究方向认为个人和团体有可能可以抵制、破坏和改变为强势集团利益服务的语言政策的运行方式<sup>[4]</sup>。在最近 20 年的语言政策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关注语言政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而且越来越关注语言政策自下而上的形成和实施过程<sup>[5]</sup>。

纵观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从政策制定到实施，有着各自不同的路径，既有典型的自上而下路径，也有典型的自下而上路径，还有其他并不典型的路径。从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角度，可以将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政策与实践的类型分为四类。第一类和第二类即语言政策研究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型比较形象，就是政府发布政策，能够一以贯之、自上而下地层层执行，政策制定者的理念能够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而自下而上型则正好相反，政策制定者发布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遭到了利益相关团体的抵制，使得政策在下行的过程中受到阻碍，而不得不对政策进行调整。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只考虑到权威集团的利益，而忽视了其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种忽视实际情况而发布的政策，在推行当中很难顺利地贯彻到底。除了典型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路径，更多国家呈现出一种政策为框架，利益相关者在框架范围内寻找平衡、不断适应的状态，利益相关者有比较大的自主发挥和回旋空间，本文称之为适度平衡型。缅甸则最为特殊，尽管在政策上华文教育不被允许，但政府态度有所松动，利益相关者根据政策制定者对待语言的态度积极作为，本文将这一类华文教育实践称为夹缝生存型。

### （一）自上而下型

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华文教育政策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型。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认定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均为官方语言。具体到教育体制中，英语占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正如李光耀所说：“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sup>[6]</sup> 1965 年，新加坡政府决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1979 年，新加坡确定了英文为主、各族群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1987 年，新加坡根据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统一语文源流，全国学校（除了特选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各族群母语为第二语文。英语不仅是所有新加坡学生必修的第一语言科目，也是数理、人文等科目的教学媒介语和学校正式活动的主导语言<sup>[7]</sup>。在“各族群母语为体、英语为用”的双语政策之下，新加坡华文教育逐渐衰落，华文学校逐步消失，华语仅仅是华语课堂上教授的语言，甚至华裔新生代已经逐渐丧失了使用民族母语的能力，新加坡华族家庭常用语言逐渐淘汰了华语转而使用英语，出现了“脱华入英”现象。21 世纪后，大部分新加坡

华裔只会说英语，只有少数华裔还能使用华语或方言。相关调查显示，以华语为家庭常用语的华族小一学生从 1990 年的 76.9% 降至 2009 年的 40%，而以英语为家庭常用语的华族小一学生人数不断攀升，从 1990 年的 26.3% 升至 2011 年的 64%<sup>[8]</sup>，英语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主要语言。这也意味着，新加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华文教育，只能算作华语教学<sup>[9]</sup>。

在双语政策实施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结合新加坡国内情况对华语教学进行宏观调控，虽然在政策实施早期遭到不少华人和华人社团的反对，也经历了南洋大学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但是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执行态度始终比较坚决。随着华裔青少年的迭代，英语作为新加坡的高阶语言占据主导地位，华语作为华族孩子的第二语言出现外语化倾向。不过，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新加坡政府的重点关注，掌握华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华语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新加坡政府意识到需要对华语课程进行必要的改革，教学目标也应从昔日的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主转向以日常华语的交际使用为主。2010 年，新加坡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sup>[10]</sup>强调让华语学习更生动，更贴近学生实际生活。随着政策的转变，新加坡华语教学又开始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由此可见，无论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主推英语，还是后来对华语教学的改革，从政策制定、发布到实施的整个过程，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政策和实践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特征。

## （二）自下而上型

从政府的华文教育政策与当地华文教育最终取得的成果来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实践路径与新加坡的实践路径截然相反。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经历了殖民时期从英文至上到建国之后独尊国语（马来语），再到后来的英语、马来语双语并重阶段。无论哪个阶段，华语作为少数民族语言一直没有获得认可。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取学习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平等权利，始终进行坚决抗争。在不断抗争中，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逐步形成了华文小学、独立中学和华文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体系。1951 年，英殖民政府推出《巴恩报告书》，建议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取代华语、泰米尔语学校。马来西亚华人为了抗议这一政策，于 1951 年 12 月成立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以下简称教总），于 1954 年成立了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以下简称董总）。这两个华校组织的建立，为马来西亚当地华文学校争取合法地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56 年，英属马来西亚教育委员会发表了《拉萨报告书》，此后马来西亚的国家语文和教育政策均以这份报告书的目标为宗旨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这也是马来西亚教育马来化的开始<sup>[11]</sup>。在《1957 年教育法令》中华文小学被列为标准型小学，获得政府全部津贴；华文中学则被列为国民型中学，只能获得政府部分津贴。该法令提出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最终目标”，为以后的教育纷争埋下了伏笔。《1961 年

教育法令》是正式推行“单元化”<sup>[12]</sup>教育政策的标志，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对中学，要求必须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对小学，教育部部长认为有权在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这之后，马来西亚全国 70 所华文中学中虽然有 54 所改制，但是仍有 16 所放弃政府津贴，成为“华文独立中学”。此后，马来西亚政府不断推行“单元化”语言政策，1971 年的《马吉依斯迈报告书》主张不以学生学业成绩，而以种族人口比例作为公立大学招生的依据，即所谓的“固打制”，华人升入大学受到限制。在政府屡次施行不公平政策之下，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始终团结一致，通过提交备忘录、建议书，发动群众以各种抗议大会、和平请愿大会等形式向政府首脑直接反映华人社团的不满情绪。

在华人社团坚持不懈地努力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这些成就是华文教育团体与马来西亚政府发布的“单元化”语言教育政策不断地博弈与抗争下取得的。可以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过程就是华人社团为了争取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抵制和改变强势利益集团语言政策运行方式的自下而上的典型案例。

究其原因，从政策制定者来看，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不够重视保持自身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特色，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中存在突出马来西亚人至上的倾向，这使新时期的族群界限不仅未能淡化，反而呈现出日渐明晰的趋势<sup>[13]</sup>。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在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华人就是新政府重要的盟友和政治力量，与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参与了筹备建国事宜。马来西亚华人、华人社团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就有着参政议政和争取自己民族权利的意识。纵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每当大选前夕，华文教育就成为政治各方较量的筹码。选举之前，候选人为了争取华人选民，就会在华文教育政策方面适当放松。当选后，马来西亚人优先的思想就会占上风。“压迫乃认同之母”<sup>[14]</sup>，正是这样的政治特点决定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空前的团结和反抗意识。

### （三）适度平衡型

如果说新加坡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型，马来西亚属于典型的自下而上型，那么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和文莱的政策与实践的路径则有所不同，方向性并不明显，基本都处于华人、华人社团在政府出台政策的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平衡或适度调整以谋求生存的状态。这成为东南亚地区不同国家华文学校具有着不同形式的主要原因。印度尼西亚实行三语学校，这是由于国家政策只允许外语教学，对于种族教育仍有限制，因此即使是传统华文学校恢复办学，也只能以印尼语、英语和华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三语学校

形式出现。泰国的华文学校则是以民办学校形式存在的。虽然汉语在泰国已经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各类学校均可以开设汉语教育，但是泰国的华文民办学校实际上处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不少华文学校面临生源、经费等问题。在越南，华文教育属于民族语言教育。从政策上来看，自1986年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尤其是1991年11月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越南华文教育逐渐恢复开展。越南教育培训部于1997年颁布通知强调，华语属于越南少数民族母语。1999年，越南胡志明市教育培训厅颁布《关于在华族同胞聚居的郡、县举办华语教学事宜指导》等文件，允许在越南华人聚集区开设华语课或者华文中心，让华人学生在“学好越南语的基础上，学好华语”<sup>[15]</sup>。而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和文莱都是在传统华文学校的基础上有所调整。菲律宾的做法是成立华校联合体——华教中心。菲律宾顺应新形势，在把握华文学校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基础上，提出作为华族应树立“华族内部的共荣共存，和菲族的共荣共存”两个观念<sup>[16]</sup>。基于这样的定位，华文学校的培养目标也就成为“为菲国培养既会菲语、英语又会华语，既是内向型又是外向型的优秀人才”<sup>[17]</sup>。老挝曾实施相关政策，华文学校的私有资产被收为国有，华文教育被迫停滞。直到中国和老挝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华文教育才得以恢复。老挝国内有5所规模较大的华文学校，比如万象寮都公学是东南亚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之一。这些华校均实行华文与老挝文并重的双语教育，提供幼儿园、小学、初中至高中的教育体系，在满足老挝文学习要求的基础之上，开展华文课程。柬埔寨与老挝的情况相仿，柬埔寨有着百年华文学校——金边端华学校，传统华文学校成为当地华族儿童学习华语和中华文化的主要渠道。文莱共有8所比较大的华文学校，并保持着逢年过节去华人社团筹集募捐资金的传统。文莱的华文学校基本上是三语并重，华文课用华语来教学，一周上至少有8节，其他科目除了马来文均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上述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形式各异，但其共性在于华文教育均是在本国语言政策框架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结果，因此，本文将之归纳为适度平衡型。总体来看，这些国家对华文教育的认同均是在政策框架下有限展开。由于政策限制，这一类型国家华文教育呈现出向华语教学发展的趋势。

#### （四）夹缝求生型

缅甸是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国家。缅甸政府在政策层面不允许华人开办华文教育，随着中国与缅甸两国关系的发展，缅甸政府对华人兴办学校基本持放任态度，尤其是缅甸北部远离政治中心且华人众多、华人社团比较强大的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华文补习学校。近年来，缅甸民间学习华语的热情持续高涨，在缅北地区随之出现高端的私立三语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效仿中国学校的办学模式，或直接与中国学校开展合作，

开拓学生将来留学中国的渠道。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吸引高端生源，不少当地富裕家庭、政府官员和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选择就读华人开办的三语学校，这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华文学校的声望。

随着中国与缅甸经贸往来不断深化，中国成为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两国民间交往日益密切，靠近政治中心的缅南地区民间学习汉语的热情也逐渐高涨，出现不少汉语培训学校和培训机构，许多师资来自缅北地区。

缅甸华人、华人社团在中缅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缅甸出生的华裔新生代积极地融入缅甸主流社会，他们兼用缅语、华语，推动中缅文化交流。同时，他们能够正视中国与缅甸在华人中的地位 and 关系，既认同祖籍国中国，也认同祖国缅甸，成为中缅两国互信互助的重要力量。缅北曼德勒福庆语言电脑培训学校李祖清校长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华文教育这种民间外交来促进住在国缅甸跟祖籍国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我们这些华人来说，中国跟缅甸的关系就像娘家和婆家的关系，娘家跟婆家的关系好了，我们才会好。”<sup>[18]</sup>

缅甸华文教育就像是在夹缝中生长的小草，故而以“夹缝生存”来命名这种类型最为生动形象。虽然是在政策的夹缝中生存，缅甸华文教育表现出了较强的发展性和灵活性，特别是缅甸华人民间的沟通合作意识和能力较强，充分发挥了其在深化中缅交流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缅北高端中文私立学校由于模仿中国办学模式或与中国学校开展合作，故而能够更多地发挥华文教育在文化传承和教书育人方面的职能，呈现出从华语教学到华文教育的趋势（见表 1）。

表 1 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政策与实践类型分析

类型	国家	政策制定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深层动因	结果
自上而下型	新加坡	语言政策自上而下实施，政策制定者的认识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	政府相对稳定，执行力较强，政策可以一以贯之；政策能够考虑到受众的利益	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消失，出现外语化倾向的华语教学
自下而上型	马来西亚	利益相关者通过坚持和抗争影响政策制定者及政策的实施效果	政策在制定中的“单元化”倾向与社会多元化需求不匹配；华人在政治当中的作用不容小视	保持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形成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适度平衡型	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越南、文莱	政策制定者发布政策，利益相关者在政策框架下进行平衡或适度调整	不同时期政府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态度不同；华人对华语的认同与坚持以及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华语学习需求增加	有从传统华文教育转向华语教学发展的趋势
夹缝生存型	缅甸	政策制定者对语言政策严苛但持宽柔态度，利益相关者努力寻求发展空间	与中缅关系直接相关；语言认同发挥作用；民间力量强大，善于利用资源	有从华语教学转向华文教育发展的趋势

## 二、华文教育分类政策的特点

将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政策和实践进行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不同类型华文教育（或华语教学）形成的原因，并区分不同类型华文教育（或华语教学）的共性和个性。在新时代，东南亚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和研究。2021

年出台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中，新增了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东南亚地区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地区，它在拥有一些显著的同时性的同时，也包含着复杂的多样性”<sup>[19]</sup>。在东南亚地区，因各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现实情况和华人地位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华文教育政策与实践类型，应针对不同类型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此外，本文也是对语言政策与实践关系的研究进行理论上突破的尝试，希望能为世界其他国家华文教育发展和其他国家民族语教育的发展在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上提供参考。

自上而下型中，政府具有稳定性和绝对权威。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华文政策的问题，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从1979年以来，新加坡针对华文政策进行过4次调整。2009年，新加坡成立华文教研中心，专门培养华文师资。根据新的形势，新加坡提出华文学习需要更加接近学生生活的主张，指出要充分利用双语环境，让学生在生活运用华文华语进行思考与沟通，同时促进学生学以致用，重视学习内容与过程的真实性，促使华语成为生活语言。在此理念的基础上，新加坡举国家之力，开发新的课程体系“乐学善用”<sup>[20]</sup>，努力将其建设成为教授华文为第二语言的中心。由此可见，这种能够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政策路径能够更及时高效地对华文政策进行调整，并相对精准地实现政策制定者的意图。

自下而上型中，民间力量和华教组织发挥的作用较大的。在华文教育的利益相关者高度团结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努力改变上层政策制定者的语言意识。不过，这个过程终究是艰辛又曲折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尽管目前马来西亚是此种类型，但如果能够使政府认识到华语的重要性，认识到马来西亚华人多种语言能力是国家的宝贵资源，进而促进政策制定者与华人社团能够达成更多共识、减少对抗和冲突。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马来西亚华裔认同正在发生转向，在如今渐趋平和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环境下，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一方面对围绕华教议题的社会运动兴趣缺失，另一方面却积极参与跨族群的社会运动”<sup>[21]</sup>。马来西亚华语资源是独一无二的，华文教育人士若能够充分利用华语价值，借鉴适度平衡型甚至是夹缝生存型的华文学校发展经验，将可能成为东南亚地区甚至世界华文教育的引领者。

适度平衡型中，政策制定者给出限定的范围和框架，利益相关者有相对的自由和回旋余地。不过，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与自下而上型不同，更多的是在政策框架下根据本国情况进行的自我适应和平衡，进行自我改革。尽管政府的政策允许，但实际支持力度有限，对于当地华文教育而言，发挥华人、华人社团的作用更为关键。由于历史原因，此类国家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在不断地寻找适合其发展的路径，这就更需要华文学校之间加强团结互助。菲律宾华文教育工作者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汇集整个华人社团的力量去发展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在后疫情时代，华文教育的发展更需要加



强区域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促进彼此互助发展。

夹缝生存型中，政策的合法化成为华文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可以在民间积极斡旋，促进华文教育在当地的合法化。应充分发挥华人、华人社团优势，利用所在国政府资源和祖籍国语言资源，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满足民间对华文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时，关注政府态度的变化风向，根据变化随时调整发展策略。

### 三、华文教育政策实践研究的启示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密切合作，在思想文化、宗教习俗甚至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有相通或相近之处，这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交往的重要优势。如果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就必须充分了解区域内各国华文教育的历史。只有全面了解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找出共性问题，并总结规律，才有可能对华文教育在该区域中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预判。正如有学者所说，一个有解释力的语言规划学，需从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践中汲取营养，并能够解释、评价历史上已有的语言规划，预判某地、某国正在发生的语言规划问题，为某国家、某组织、某地区、某领域作出科学的语言规划<sup>[22]</sup>。

通过对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政策与实践的类型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理想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路径是政策制定者与利益相关者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一旦双方的利益诉求分歧较大，将可能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实践说明，语言政策自上而下的途径对于政策执行者而言最为便捷，但从实践效果来看，新加坡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华文教育，发展更多的是华语教学。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不但难以复制，而且过程异常艰辛，需要华文教育组织空前团结，向政策制定者发出最有力的声音。因此，理想的政策在制定之前应该尽量去了解不同利益者的诉求，避免过于关注某一方利益，如果政策制定者过于强调强势利益集团的诉求，而忽视其他族群的现实需求，将可能会引起争论、矛盾甚至是冲突。努力寻找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正视现实，或能实现共赢、共享、互助的良好局面。

第二，语言教育政策对语言教育实践发挥关键性作用，但不是必要条件。语言态度、语言认同在具体实践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实践正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缅甸政府的对待语言的态度在实践中也同样关键，如果政府的态度宽柔，对于华文教育实践来说就是一个良好信号。另一方面，缅甸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语言认同正相关。无论是自下而上型、适度平衡型，还是平缝生存型，都体现出华文教育工作者对华语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正是因为这种认同才有了之后的不懈努力。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发生了变通，也是民族语言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政策的妥协，是根据本国历史、

现状进行的调整。

第三，华文教育不仅是民族母语传承和文化教育问题，更是与政治息息相关。语言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人际沟通和文化交流问题，而是极其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23]。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地缘相近，因此，华人移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人数众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当地华裔的地位和华文教育的发展。政治因素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走向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在华文教育政策研究中，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诸如政府对华人的看法和态度，华侨华人住在国与中国的关系，政府对语言功能的认识程度、观念及定位等等，这些因素都深刻影响着华文教育的发展走向。

第四，从国际中文教育新的起点下审视华文教育，应注意区域国别化的分类施策。2019年11月，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中国长沙举办。“国际中文教育”的概念引发广泛关注。郭熙等学者从教学类型出发，将国际中文教育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其特点是目标语环境的、成建制的第二语言教学，对象多为成人；二是中国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是处于非目标语环境的、多样化的中文作为外语的教学，教学对象覆盖多个年龄段、多个层次；三是中国海外的“华文教育”，其对象主要是华人社会中学龄和学龄前的华裔子弟<sup>[24]</sup>。海外华文教育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分支，承担了海外华侨华人传承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作用。而海外华文教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海外不同区域的华文教育情况各异，相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华文教育情况也有所不同<sup>[25]</sup>。因此，只有深入进行区域国别化研究，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进行分类施策，才有可能更加精准、科学、高效地指导当地华文教育更好地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卞晨光. 东盟成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EB/OL]. (2020-02-23)[2022-05-05].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23/content\\_5494368.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3/23/content_5494368.htm).
- [2] 本文所指的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主要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文莱和缅甸的华文教育，不包括东帝汶。
- [3] RICENTO T.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0 (2): 196-213.
- [4] 托尔夫森. 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M]. 俞玮奇, 译. 2版.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33.
- [5] 高雪松, 康铭浩. 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问题和路径[J]. *语言文字应用*, 2021 (1): 16-27.
- [6] LEE K Y.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M]. Singapore :Times Media Drivate Limltded Times Press, 2000:173.
- [7] 吴英成, 黄志远. 新加坡华语政策与规划的硬道理[J]. *Global chinese*, 2015 (1): 1-13.
- [8] 数据来源于 2011 年 9 月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瑞杰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中秋庆祝会上的讲话。

[9]本文认为,华文教育是针对海外华侨华人和华裔青少年开展的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主要功能是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保持中华民族特性和认同,有育人的功能。华语教学更多是一种语言教学,在语言传承、文化保持和认同的育人功能上比较弱。

[10]Mother Tongue Language Review Committee. Nurturing active learners and proficient users: 2010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review

committee report [R].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1.

[11]王焕芝,洪明.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政策的演变及未来趋势[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191-195.

[12]这里的“单元化”是相对于“多元化”的提法,指在教学中只能用一种语言而非多种语言。

[13]贾文娟.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马来西亚语言政策[J]. 渤海大学学报, 2018(4): 21-25, 79.

[14]约瑟夫. 语言与政治[M]. 林元彪,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45.

[15]彭振声. 越南华族学生的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以胡志明市华文教育为例[J]. 东南亚纵横, 2019(5): 89-96.

[16][17]黄炳辉,黄端铭.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漫谈菲律宾华文教育[J]. 海外华文教育, 2000(2): 44-47.

[18]李春风. 缅甸华语传承模式研究[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4): 19-28.

[19]奥斯本. 东南亚史[M]. 郭继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4.

[20]根据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院长符传丰博士的演讲整理。

[21]王晓平,张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转机[J]. 东南亚研究, 2021(5): 114-133, 157-158.

[22]李宇明. 语言规划学说略[J]. 辞书研究, 2022(1): 1-17, 125.

[23]刘振平,闫亚平,罗庆铭. 东盟华文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深层动因探赜[J]. 北部湾大学学报, 2020(7): 52-58, 80.

[24]郭熙,林瑀欢. 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3-16(3).

[25]姚敏. 华文教育关键影响因素分析[J]. 语言规划学研究, 2017(1): 67-72.

**(本文来源: 东南亚纵横)**

## ◎热点分析

### 大国竞争下，东盟如何坚守平衡外交，走稳崛起之路？

葛红亮

（葛红亮，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

东南亚已然步入后疫情时代。在2月9日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2023》中，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直言，“东南亚国家2022年已逐步走出疫情的阴影，人们对疫情的担忧也已明显消退”。

不过，似乎来不及欣喜，菲律宾近期加强与美、日深化防务合作，不仅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更让后疫情时代东南亚面对的现实问题更为凸显：面对大国竞争，东盟将何去何从？东盟能否继续崛起？

回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对东盟在后疫情时代的关注有所把握，观察东盟及其成员国是否在言行中寻求解决问题。而菲律宾作为东盟成员国中为数不多的美国盟国，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分析案例。

在《东南亚态势报告：2023》中，菲律宾民众的关注体现出高度的现实关切，气候变化和地区灾害（76.8%）和就业与经济复苏（60.6%）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随后才是地区安全紧张局势（50.5%）和社会经济差距问题（38.4%）。

关注展现需求，民众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内政聚焦和利益诉求，也必然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动向。据此逻辑，当我们再来看马科斯近期与美、日加大防务外交，将会获得更为冷静、客观的认识。

**首先，马科斯政府与美日的合作加强是全面的，并非只有防务领域，而经济领域也被视为是重中之重。**以菲日为例，我们在关注到菲日签署“访问部队协议”可能性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马科斯此番访问日本所获得的大量国际援助。

日本政府承诺至2024年将为菲律宾提供包括政府开发援助（ODA）和民间投资在内的6000亿日元援助，以帮助马科斯政府实现菲律宾2025年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不仅如此，日本是菲律宾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占菲律宾经济区发展局所批准投资总额的27%，被菲律宾看作是“重振制造业”的关键。

**其次，马科斯政府与日本的合作，聚焦于人道主义救灾协议。**尽管日菲两国可以抓住

人道主义救援的契机加强两军的联合训练，但所签署的救灾协议对派遣目的作了“救援和人道支持”的明确限定。

再者，马科斯政府与美日加强防务合作，意在提升菲律宾防务现代化能力。菲律宾向美国新增开放四个军事基地，美国则宣布将拨款 8200 万美元用于现有军事基地基础设施发展，并将向菲律宾援助无人机等有助于增强菲律宾南海监测能力的军备，而日本对菲律宾的援助也包括供海警使用的巡逻艇。

最后，马科斯政府着眼于地区紧张局势和南海“权益”，但再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急先锋”，却并不符合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和最大利益考量。2022 年 12 月 15 日，马科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曾清晰阐述菲律宾政府的外交政策，奉行独立外交政策、致力于和平与追求国家利益、保持中立构成了马科斯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这意味着，马科斯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与杜特尔特政府并无太多不同。

无可置疑的是，由于并不存在杜特尔特般的厌美情绪，马科斯在寻求美菲同盟关系转圜、加强和提升日菲防务合作方面，都相对走得远。对于菲律宾与美日的防务合作，马科斯在受访称，“美日菲协议”应该成为在“混乱”和“危险”局势中加强三边关系进程的一部分。但同时他也表示，“即使美、日、菲达成了三方协议，也不同于北约那样的军事联盟”。

这就意味着，同美日交往中追求经济与安全利益，被马科斯政府视为是菲律宾整体对外交往的其中一环，但马科斯政府同时也深知，成为美、日在地区开展对华竞争的代理人不仅将让上述经济与安全利益付诸东流，而且可能让菲律宾陷入危险境地。

菲律宾是我们观察东盟国家的一个例子，也是缩影。如同菲律宾强调独立、中立与国家利益、地区和平，东盟也重视经济复苏和区域稳定，强调自身在地区多边框架中的“中心性”。凭借着成员国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在地区多边框架中的“中心性”以及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不断彰显的影响力，东盟创造了成长和影响力增强的奇迹，东盟崛起似乎越来越成为亚太地缘政治的重要现实。

但在日益激烈的大国战略竞争和不确定形势下，东盟面临着不同于往日的挑战，82.6% 的受访者也对东盟的效能表达了不满，其未来继续崛起也将困难重重。作为东盟 2023 年轮值主席国，印尼已经认识到困境，将“东盟事务：增长的中心”定为年度主题，希望借此加强东盟的效能、团结、东盟的“中心性”，以促进东盟作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中心。

印尼总统佐科更是强调，面对大国竞争和博弈，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势力的代理人。显然，这为东盟继续朝着 2025 及之后的共同体愿景迈进，提供了更多可能。（本文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